

第 **42** 期 2014年4月2日

中国经济还有50年增长期

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顾海兵

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如果把它看得简单一些,就要观察中国国情。中国的国情特征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气势、大势、走势,即使出现波动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也是有规律可循的。通过计算,我们大概需要 15 年可以赶上目前的美国经济总量,然后再过 15 年可以赶上美国下一个 15 年后的经济总量,最后大概用 50 年可以在人均 GDP 上和美国拉平。所以,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发展中阶段,这个阶段起码还要经历四五十年。排除动乱战争等不可控因素,不管政治怎么变,这个发展大趋势应该变化不大,即中国经济还有五十年增长期。



维持增长的动力及趋势

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?

首先,中国国土面积大、人口众多,是大国。就经济总量而言,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,中国经济排名在世界上没什么地位,但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第二。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(国内生产总值)达到47万亿元。按官方汇率折算,约为7.5万亿美元,相当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一半,并且已经把原来第二的日本甩到了后面。有人估计,2020年左右,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位。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,如此大的经济总量加之地广人多,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相当充分的发展空间,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。

其次,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还和投资有关系。这几年中国经济大致保持在7%至8%的增长率。大规模的投资热潮较前几年有些消褪,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下就是多少万亿,但民间投资一直都在不断孕育。总体而言,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,很多方面还处于改善状态,而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状态所以经济增长缓慢。

最后,中国经济增长还和中国市场化改革有关。我国目前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,而是处于一种转型期。从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研究结果来看:1978—1992年为非市场经济;1978年之前为高度的非市场经济(集权经济),市场化程度在10%以下,到1989年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至30%至40%,处于半市场经济的混合形态;其后的1989—1991年市场化程度则有所下降,回到30%左右;1992—2012年为半市场经济,其中1992—1999年期间的市场化程度逐步

提高,由30%增加到50%左右,达到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边缘。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,通常的说法是,改革处于攻坚阶段、还没有过大关、还处于深水区,总体上是半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,市场化程度大体是50%—60%。如果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,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还有可能再上一个台阶。

就增长的趋势而言,从长远来看,只要不发生大动乱,四、五十年的经济增长期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。剩下的只是周期性波动,比如现在正处于低潮,再过一两年可能又出现一个小的高潮。就目前形势来看,5%-6% 应该是增长底限,不太可能更低。总之,沿着目前的格局慢慢往前走,四、五十年的经济增长期不会有太大问题,也许5年左右有一个小周期,比如一般党代会召开的那一年增长率要高一点,因为大局已定,之后可能低一点,这都和国家体制有关系。

改革的方向及其对于增长的作用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,这一点毋庸置疑,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要提高,要市场说了算。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在50%—60%,市场化改革尚在途中、远未完成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,中国太大,不同地区发展速度不同,任何改革都不太可能一步到位,最终只有这样慢慢地一步步往前走。

改革对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,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市场的作用,让市场说了算,这就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。比如,如果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是不是更好?这样人为的进入壁垒减少了,竞争加强了,经济就有活力了。所以如果考虑改革因素,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更高,反之可能会降低。



值得注意的是,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力度正在减弱,即改革能够折腾的资源空间总体在减少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也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减少。具体而言,改革仅能影响财政收入这一块。财政收入中有一块增量,即每年增长的收入,容易受到不同的人的影响,但就存量而言,谁都动不了。比如财政收入增长5000亿,是国防多一点,还是国有企业多一点,还是教育多一点,它只是各家怎么分这么一个概念。所以说,改革对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在量上偏少;另一方面来说,能够被政策所影响的资源也在减少。

自贸区的启示及对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建议

首先,自贸区应该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,这样更能体现公平。80年代成立的深圳特区,对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及市场化的转型起了积极作用,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,改革的游戏规则应该更加注重公平。比如在哪里成立自贸区,各地都可以展开竞争,自贸区应该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。政府应出台程序规定成立自贸区的条件,符合条件的地区就可以参与,不需要所谓审批,这样才更加公开透明。

其次,城镇化应该区别对待,全国情况不一样,不要简单搞城镇化,更要警惕借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财政。实际上,对城镇这个概念的理解应更加准确, 美国 500 人聚居区就算城镇,但在中国起码需要 5000 人。像广东的有些镇有 30—50 万人,相当于一个小城市。"城镇化"本身没有问题,但要防止一些官员 以城镇化的名义搞土地财政,把土地卖钱,这是人为的城镇化。城镇化应该是一



个自然过程,而不是像很多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强行拆迁,造一些鬼城。而且,城镇化具体怎么做,应该视情况而定。比如,有些地方需要城镇化,有些地方其实需要乡村化,比如北京。所以,不要简单地全国搞城镇化,应该由各地政府来决定,中央在这一方面应该放手。

第三,下放行政审批权应该做得更彻底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央政府下放行政审批权达 400 多项,但是审批权下放到省里收效甚微,比如申报一个项目还是要盖 100 多个公章。审批权下放到省里根本没有实现权力的解放,对企业而言还是政府在管。所以不应该设立审批制而应该是注册制。建设服务型政府,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这一大方向是对的,但是改革进程中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很多方面没有做到位甚至没有做。经济的突破口在哪里?政府少管就是之一。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制定规则,其它的应该少管甚至不管。

总之,中国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只有不长的 30 多年时间。30 多年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能由 5%—10%左右提高到 50%左右,提高了 5—10 倍,成果显著。即使和成熟的市场化经济国家相比,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变化。然而,基于中国人口众多、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,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注定会是非常艰难的。因此,应该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估计得低一些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困难估计得高一些,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。

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

电话:010-62516305

官方网站:rdcy-sf.ruc.edu.cn 新浪微博:@ 人大重阳邮箱:rdcy-info@ruc.edu.cn 公众微信号:rdcy2013